

悦城龙母传说探源

蒋明智

悦城龙母传说源远流长，影响深广。但长期以来，学人们都把它看作是唐代的产物，但从历史文献来看，其最早记载当在西晋，比唐代的记载要早五百余年。从历史记忆的视角考察，龙母传说与秦始皇发生联系并非故事情节的任意粘连，而是有着地域历史文化的积淀，它既保留了秦始皇时期帝国征服与土著抵抗的集体记忆，又形象、真实地反映了秦始皇统一岭南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历史状况，起源古老，值得珍视。

关键词：悦城 龙母传说 秦始皇 历史记忆

作者：蒋明智，1966年生，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教授，《文化遗产》编辑部主任。

—

容肇祖（1897—1984）在《德庆龙母传说的演变》^①一文中认为，龙母传说的成立期主要在唐代的一百年间。其见诸记载的，最早是唐刘恂（生卒年不详）《岭表录异》里的《悦城龙母》：

温媪者，即康州悦城县霜妇也，绩布为业。尝于野岸拾菜，见沙草中有五卵，遂收归置绩筐中。不数日，忽见五小蛇壳，一斑四青，遂送于江次，固无意望报也。媪常濯浣于江边。忽一日，鱼出水跳跃，戏于媪前。自尔为常，渐有知者。乡里咸谓之龙母，敬而事之，或询以灾福，亦言多征应。自是媪亦渐丰足。朝廷知之，遣使征入京师。至全义岭，有疾，却返悦城而卒。乡里共葬之江东岸。忽一夕，天地冥晦，风雨随作。及明，已移其冢，并四面草木，悉移于西岸矣。^②

后人在论及悦城龙母传说的最早记录版本时，多持此论。如叶春生就认为：“德庆龙母的传说，始见于唐代广州司马刘恂的《岭表录异》，后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加以补充，再后各朝碑记、诰敕又有发展。”^③但笔者检阅有关文献，发现这并非悦城龙母传说的最早记载。

比《岭表录异》记载要早的，在唐代就有卢肇（818—约901）的《阅城君庙记》。卢肇，唐代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市）人，唐武宗会昌三年（843）中进士第一，为江西历史上第一个状元。其作《阅城君庙记》得益于其叔卢萼（生卒年不详）的经历。卢萼在唐元和年间（806—820）曾游仕南越，代理康州（今广东德庆县）录事参军一职，常到悦城龙母庙烧香祈祷，希望能升任县令。一天夜晚，他梦见龙子对他说：“你当了此官，会报答我吗？”卢萼当即许诺。第二天，他占

① 容肇祖：《德庆龙母传说的演变》，《民俗》周刊1928年第9期，第1—2页。

② 刘恂：《岭表录异》卷上，中华书局，1985年，第7页。

③ 叶春生：《龙母信仰与西江民间文化》，《中国民间文化》1990年第2期，第77—78页。

得“见龙之贞”的吉卦。太和五年（831），卢肇如愿以偿，出任宜春县令。次年大旱，他祈祠龙母，保佑县境风调雨顺，并在水陆交通枢纽的昌山渡创建龙姥庙，亦称阅城（即悦城——笔者注）君庙。卢肇在《阅城君庙记》一文中对这一传闻有记载：

元和中，故宜春县令卢府君尝游宦南越，乞灵于龙，契乎其旨，尝梦龙伯谓之曰：“君将宰邑江西，其致我焉。”许之。及太和五年，岁在壬子，府君来宜春，遂立祠于邑东昌山津右。府君讳萼，举孝廉，三迁为宜春令。始至，遇邑大饥，令豪族以陈积周赋贫民，故得不佻不病，不横不流，民从其化矣。夫神物莅乎阴，府君之美政，微龙之辅乎？予于府君为宗侄，予为儿而府君多之曰：“乃异日其闻乎！”故予始终龙姥之事，及载府君置祠之旨焉。^①

据《宝刻类编》载：“卢肇，歙州刺史”，“《阅成君庙碑》撰并篆书，刘驯之书，大中三年十二月一日建”。^②此碑后载入《文标集》卷中，题《阅成君庙碑记》，未具年月，碑在袁州。^③由此可知，《阅成君庙碑记》先有碑刻，然后才被收入文集。其碑刻时间是在大中三年，即 849 年，比《岭表录异》要早半个多世纪。

《阅城君庙记》已记录了悦城龙母传说的大貌，摘录如下：

昔者秦毒天下，神鬼乏主，英精怪质，潜跃失次。故龙遁乎涨海之涯，托乎嫠姥之室，圆苞不阵，霞锦相光，鳞鬣未生，风雨如晦。姥既耽之在手，覆之以衣，一夕，威灵欲震，雷电皆至，龙遂育焉。厥后姥以母，龙以子，提护萦绕，如乳如嬉。或游于泉，或跃于汙，姥方朝膳，必荐鲜鳞。他年，姥斲鳞于溪，龙游于刃下，而尾触銛锋，姥骇视之，则堕数尺矣。因泳去，于是盘天乘风，出幽入冥，恍惚变化，潜乎乾，战乎坤，不知其往矣。姥恨其误伤，竟不复至，而姥亦逾乎鲐鲩，克慎厥化。姥无姻戚，阅城人葬之水涯，惟龙乃寓形于人，衰杖如瘵，溲苦涕块，哀乎浹日。谓人曰：“藏我母卑矣。他日潮水啗之，非葬之所也。其将假尔牛马为役，以迁于显爽。”一夕，风雷大至，明日视之，则姥之封若覆夏屋矣。在于山颠，里之中牛马皆殆不饮齧，齐衰者亦亡所在。阅城人立姥及龙之象，以礼祠之。^④

该传说由于是卢肇听其叔所讲，自己并未到过悦城，与原作有出入在所难免，但龙子化育、断龙尾、移墓葬母等龙母传说的主要情节都已具备。

刘恂在唐昭宗（889—906 在位）时任广州司马。任期届满，时值长安动乱，他返京述职不成，滞留广州，根据见闻，写成《岭表录异》一书。因而其书之成应在 906 年以后，至少要比卢肇的《阅城君庙记》晚二三十年。

再往前追溯，唐代李景休（生卒年不详）和赵令则（生卒年不详）在碑刻中所记录的龙母传说，又比《阅城君庙记》早。宋代张维（956—1046）在《永济行宫记》中提到：“唐太和中，李景休、会昌赵令则刻文于碑，详矣。”唐太和中，即 830—832 年间，此时江西宜春的卢肇初任县令，尚没有《阅城君庙记》一文的诞生。李景休和赵令则的碑刻早已不存，其文不可得见，但好在张维在《永济行宫记》中有复述：

永济夫人龙母温氏者，晋康郡之程溪人也。其先不可得考记。秦始皇时，夫人浣于江，岸旁得卵如斗，异焉。持归藏器中，后有物如守宫，破卵而出，长数尺，性喜水，投之江，嬉游自适。每夫人往观，辄以鱼置其侧而去。一日，夫人治鱼，误挥刀斩其尾，遂不复见。久之复来，遍身生鳞，文有五色，头有两角，夫人与邻里始以为龙。郡守以上闻，秦始皇遣使尽礼致聘，将纳夫人于宫。夫人不乐，使者敦迫上道。数旬，至始安郡。一夕，龙引所乘

① 董浩等编：《全唐文》卷 768，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4713 页。

② 《宝刻类编》卷 6，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89 页。

③ 参见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下》，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675 页。

④ 董浩等编：《全唐文》卷 768，第 4713 页。

船还程水，使者复还，龙复引归，凡数次。夫人果以疾殒。既葬西源上，后大风雨，其墓忽移于江北，即今悦城也。阖境畜乘皆汗而疲困，昼夜号哭有声如人。远近神之，共立龙母庙于墓旁，祈祷应答如响。唐太和中，李景休、会昌赵令则刻文于碑，详矣。^①

该碑文在介绍龙母传说时，虽与李景休、赵令则碑文所记详略不一，但龙母传说的全貌已在其中：龙母拾蛋得龙、龙母误断龙尾、秦始皇征召龙母未果、龙子移墓葬母等情节单元都已具备。这应是唐代记载最早的龙母传说。

二

在唐以前是否还有龙母传说的记载？这是把握龙母传说的一个关键。因为在容肇祖看来，唐代才开始出现龙母传说。在这一观念影响下，他把《太平寰宇记》引述《南越志》所记《端溪温媪》，看作是宋代的产物：“乐史在太宗（公历 975—997）时上书言事，于淳熙中（984—987）献所著书四百余卷，则《太平寰宇记》所载，为南汉入宋后，至淳熙前所有之传说。那时龙母的传说有点增加改变了。”^②这一看法显然忽略了《南越志》的史料价值。

《南越志》系南朝刘宋年间（420—479）沈怀远（411—470）所作，记载三代至晋岭南地域沿革、地方山川名由、民间传说、风俗习惯以及珍稀物产，尤以动、植物为最。惜原书已佚，我们只能从后世辑录它的著作中，了解其真实面目。《隋书·经籍志考证》：《南越志》8卷，沈氏撰；《旧唐书·经籍志》：《南越志》5卷，沈怀远撰；南宋陈振孙（约 1186—1262）《直斋书录解題》：《南越志》7卷，宋武康令吴兴沈怀远撰。^③明代董斯张（生卒年不详）所辑录的《吴兴艺文补》则曰：“怀远志南越见隋书，陈振孙亦载其目，盖宋世犹有存者。余从诸书录之。”^④可见，《南越志》在宋时尚存。我们通过比较《吴兴艺文补》和《太平寰宇记》所辑录的龙母传说，来判断《南越志》记载《端溪温媪》的可信性。《吴兴艺文补》里的记载是：

昔有温氏媪者，端溪人也。居常涧中捕鱼以资日给。忽于水侧遇一卵，大如斗，乃将归，置器中，经十日许，有一物如守宫，长尺余，穿卵而出，因任其去留。稍长尺五，便能入水捕鱼，日得十余头。稍长二尺许，得鱼渐多。常游波中，萦回媪侧。媪后治鱼，误断其尾，遂逡巡而去，数年乃还。媪见其辉色炳耀，谓曰：“龙子今复来也？”因盘旋游戏，亲驯如初。秦始皇闻之，曰：“此龙子也，朕德之所致。”留使者以玄珪之礼聘媪。媪恋土，不以为乐，至始兴江，去端溪千余里，龙辄引船还，不逾夕至本所。如此数四，使者惧而止，卒不能召媪。媪殒，瘞于江阴，龙子尝为大波至墓侧，策浪转沙以成坟，人谓之掘尾龙。今人为船为龙掘尾，即此也。^⑤

《太平寰宇记》所记内容是：

《南越志》云：昔有温氏媪者，端溪人也。居常涧中捕鱼以资日给。忽于水侧遇一卵大如斗，乃将归，置器中，经十许日，有一物如守宫，长尺余，穿卵而出，因任其去留。稍长五尺，便能入水捕鱼，日得十余头。稍长二尺许，得鱼渐多。常游波中，萦回媪侧。媪后治鱼，误断其尾，遂逡巡而去，数年乃还。媪见其辉光炳耀，谓曰：“龙子复来耶？”因盘旋游戏，亲驯如初。秦始皇闻之，曰：“此龙子也，朕德之所致。”诏使者以元珪之礼聘媪。媪恋

① 《悦城龙母庙志》（2卷），光绪十三年东裕堂藏板，第27—28页。

② 容肇祖：《德庆龙母传说的演变》，《民俗》周刊1928年第9期，第3—4页。

③ 参见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73—274页。

④ 董斯张辑：《吴兴艺文补》卷2，明崇祯六年刻本，第26页。

⑤ 同上。

士，不以为乐，至始安江，去端溪千余里，龙辄引船还，不逾夕至本所。如此数四，使者惧而止，卒不能召媪。媪殒，瘞于江阴，龙子常为大波至墓侧，萦浪转沙以成坟，人谓之掘尾龙。今南人为船为龙掘尾，即此也。^①

两相对照，几无差别，说明它们来源于《南越志》所记《端溪温媪》同一版本。此外，明李贤（1427—1464）撰《明一统志》、道光《广东通志》和《肇庆府志》所述龙母传说，皆与《太平寰宇记》所引相仿。清代钦定《渊鉴类函》也将其收录，全文如下：

《南越志》曰：昔有温氏媪者，端溪人也。常居涧中，捕鱼以资日给。忽于水侧遇一卵，大如斗。乃将归置器中。经十日许，有一物如守宫，长尺余，穿卵而出，因任其去留。稍长二尺，便能入水捕鱼，日得十余头。稍长五尺许，得鱼渐多。尝游波水，萦回媪侧。媪后治鱼误断其尾，遂逡巡而去，数年乃还。媪见其辉色炳耀，谓曰：“龙子今复来也。”因盘旋游戏，亲驯如初。秦始皇闻之，曰：“此龙子也，联德之所致。”乃使以玄珪之礼聘媪，媪恋土不以为乐。至始安江，去端溪千余里，龙辄引船还。不逾夕，至本所。如此数四，使者惧而卒止，不能召媪。媪陨瘞于江阴，龙子常为大波，至墓侧萦浪转沙以成坟，人谓之掘尾龙。今人谓船为龙掘尾，即此也。^②

我们不厌其烦地列举上述材料，目的是想说明，自宋代《太平寰宇记》到清代《渊鉴类函》，其中所引《南越志》之《端溪温媪》，具有内容的一致性和历史的连续性，可以形成“证据链”，由此证明沈怀远《南越志》记有《端溪温媪》的可信性。

再往前追溯，晋代顾微（三国孙吴至西晋时人，生卒年不详）在《广州记》中，就已提到了悦城龙母的传说，原文亦已佚。唐代白居易（772—846）在《白氏六帖事类集》“程溪浦口”引顾微《广州记》曰：“程溪浦口有蒲母养龙，列断其尾，因呼掘龙，时人见之，则土境大丰而利涉之。”^③《艺文类聚》“程溪浦口”条也引顾微《广州志》（应为《广州记》——笔者注）云：“溪浦口有蒲母养龙，裂断其尾，因呼龙掘，人时见之，则土境大丰而利涉也。”^④

“程溪浦口”在悦城龙母庙和龙母墓附近。据《德庆州志》载：“零陵水在州东九十里，自广宁界流入境，凡百余里，南入江，可通舟楫。一名程溪浦，出州东七十里，龙岩下有龙母温媪墓，亦曰温水，亦曰灵溪。”^⑤蒲母养龙裂断其尾，应为悦城龙母传说的异文。但该传说十分简略，既无故事发生的时间，也无背景，龙母裂断龙子尾巴的缘由亦无介绍，尤其没有移墓葬母的核心情节，因而传说所记应为龙母传说的一个片段。这一片段主要是用来解释“龙掘见，境大丰”的气候现象，与沈怀远所记龙母传说解释“船为龙掘尾”迥然而异，在以后西江流域的正史、地方志、笔记小说和庙志中，均无类似记载。而且龙母的蒲姓说法也只在《广东新语》、《肇庆府志》等少数书中作为一说提及，但不占主流，故《太平寰宇记》和钦定《渊鉴类函》均采用《南越志》的版本。这说明，顾微所记龙母传说并非悦城龙母传说的原貌。作为江苏苏州人，顾微到岭南只采录到传说的一个片段，而将机会留给了二百多年后的沈怀远。

沈怀远，浙江德清县人，刘宋世祖（454—464）时，曾为始兴（今广东韶关市）王刘浚的幕僚，后因事牵连被流放广州，至前废帝即位（465），才回到德清做了武康令，在岭南地区前后生活十余年。由于谙熟岭南生活，他对南越诸事的记载较为具体、仔细，其《南越志》内容多达数卷，是《广州记》无法比拟的，所记悦城龙母传说也已定型。虽然从记录的时间上看，《南越志》

①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64，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古逸丛书本，第979页。

② 张英等编：《渊鉴类函》卷437引《南越志》，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547页。

③ 白居易：《白氏六帖事类集》卷2，民国景宋本，第69—70页。

④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9“水部下”，明嘉靖间胡绩宗刻本，第142页。

⑤ 《德庆州志》，叶镜辉等点校，广东肇庆端州报社印刷厂，2002年，第218页。

晚于《广州记》；但从内容上看，《南越志》所记“掘尾龙移墓葬母”是悦城龙母传说的主体，《广州记》所记“龙掘见，境大丰”只是其中的枝节，主体和枝节之间存在着前后相继的内在联系，主体解释“龙掘”的由来，枝节是在主体基础上进一步解释某种信仰的由来。由此，可以推断，在顾微记录“龙掘见，境大丰”型传说之前，“掘尾龙移墓葬母”型传说已流行于世；或是“龙掘见，境大丰”型传说的枝节原本就是“掘尾龙移墓葬母”型传说的组成部分。

后世流传的龙母传说为上述看法提供了一个佐证。据《文登县志·杂闻》载：

县南柘阳山有龙母庙，相传山下郭姓妻汲水河崖，感而有娠，三年不产。忽一夜雷雨大作，电光绕室，孕虽免（娩），无儿胞之形。后每夜有物就乳，状如巨蛇，攀梁上，有鳞角。怪之，以告郭。郭候其来，飞刃击之，腾跃而去，似中其尾。后其妻死，葬山下。一日云雾四塞，乡人遥望，一龙旋绕山顶。及晴，见冢移山上，土高数尺，人以为神龙迁葬云。后秃尾龙见，年即丰。每见云雾毕集，土人习而知之，因构祠祀之。^①

这是清代记录的山东秃尾巴老李传说。笔者曾在《龙母传说比较研究》一文中，探讨了悦城龙母传说与山东秃尾巴老李传说的渊源关系，认为山东秃尾巴老李传说来源于悦城龙母传说。^②在山东秃尾巴老李传说中，“移墓葬母”和“秃尾龙见，年即丰”的两个情节单元，恰好复合了上述悦城龙母传说的两大类型。从该传说也可以看出，老李移墓葬母是故事的主体，而“秃尾龙见，年即丰”则是故事的枝节。也许，“移墓葬母”和“秃尾龙见，年即丰”本来就是粘连在悦城龙母传说之中的，后来由于采录的原因，才被分离出来，各自独立。

顾微和沈怀远都是外省人，他们到岭南后才相继将龙母传说记录整理成文，因而，在他们采录之前，龙母传说在民间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口头讲述过程是毫无疑问的。

三

以往科学实证的历史研究通常把传说与历史二元对立起来，而后现代史学却对此进行了质疑，认为无论口头传说还是历史文献，都是“历史记忆”的不同表述方式，正如赵世瑜所指出的：“传说对历史学家来说就同样也是有意义的，它可以和历史放在同等的价值层次上，也即在历史记忆的意义上，传说与历史文献传达的历史在价值上是平等的。”^③这种历史记忆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历史是一种集体记忆；第二，记忆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第三，那些具有所谓的负面影响的历史事件，或者由于政府的禁止，或者由于让人难堪而不便被公开，或者人们强迫自己去遗忘或不去思考，但对于某些事件来说，人们强迫遗忘的企图往往是不成功的，一旦人们被告知说不要去谈论某件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却往往被记忆下来。^④借助这一理论，我们从历史记忆的视角，进一步探讨龙母传说所蕴含的历史信息。

在悦城龙母传说中，无论是典籍记载，还是民间传说，没有不提到秦始皇征召龙母入京的情节，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根据传说的有关理论，传说较之于一般文学作品，与历史有更密切的联系，“这是由于传说往往直接讲述一定的当前事物或历史事物，有时并采取溯源和说明等狭义的历史表述形式。人民通过传说，述说历史发展中的现象、事件和人物，表达人民的观点和愿

① 李祖连修，于森逢撰：《文登县志》，清光绪23年修，民国22年铅印本，第60页。

② 蒋明智：《龙母传说比较研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第9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7—210页。

③ 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184页。

④ 同上，第183—184页。

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传说可以说是劳动人民“口传的历史”^①。一些治史的专家也并不怀疑,“传说日久,附加的理想成分越多,可是它的本身确是当日实在经过的事件,并不是某些人臆想的结果”。^②龙母传说的文字记载最早是在西晋,而其口头传统最早是否可以追溯到秦始皇时代?这需要对龙母传说的文化信息及其与秦始皇的关系作进一步的分析。

据《淮南子》载:“(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瓠)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③经过激烈的战争,秦始皇终于在公元前214年占领了越人分布的岭南地区。西呕亦称西瓠,是百越民族群体中的一部分,大体分布于汉代的郁林郡和苍梧郡,其东有南越、东瓠,北为五岭,西有骆越,约相当于桂江流域和西江中游一带,即今桂东南及粤西南这一片。这正是龙母传说圈的流传地。

据研究,龙母的族属为疍民。陈摩人在《龙母传说的民族学考察》一文中指出:

考古发掘与历史记载,将疍人与悦城龙母传说的关系也描绘出大致的轮廓。《德庆州志》(《旧闻志·杂录第二》)上也说:“一种居水以舟楫为家,捕鱼为业者名疍,无冠履、礼貌、文学,见水色知有龙,故又曰龙户。”对此,可以这样示意:龙母—五龙子(巨卵孵生)—龙户(人)。^④

清顾炎武(1613—1682)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引《博罗县志》说:“蛋(现改为疍——笔者注)其来莫可考。按:秦始皇使尉屠睢统五军,监禄杀西瓠王,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意者此(指疍民——笔者注)即入丛薄中之遗民耶?以鱼钓编竹为业,以舟为宅。”^⑤这段话,论述了疍人的由来与秦始皇的镇压政策有关。

这一史实,必将在民族的传说故事中留有影子。龙母传说可以说是对这一具有重大负面影响事件的历史记忆。传说讲,秦始皇派使者征召龙母入京,使者的船由德庆行至广西桂林,五龙子连夜把船拉回德庆,如此反复四次,使者无功而返,这就隐性传达了越人对秦始皇的抗拒心理。

但秦始皇统一岭南,客观上也推动了岭南地区的封建化进程。他采取了一系列怀柔越民族的政策,在客观上对越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融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前述《渊鉴类函》引《南越志》说:“秦始皇闻之,曰:‘此龙子也,朕德之所致。’乃使以玄珪之礼聘媼,媼恋土不以为乐。”“朕德”也就是秦始皇的“水德”。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创立“五德终始”说,“五德”即五行之德,指金德、木德、土德、水德、火德,认为古帝王之兴,必居其中一德,上天还将显现祥瑞,以符应示知人们。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向天下宣称“方今水德之始”,^⑥“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⑦由此可知,龙是水德的祥瑞,是秦始皇君权神授的象征。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岭南出现了龙母养育五龙子的传说,这正是大秦帝国祥瑞的一个迹象,也是越、汉融合的一种反映。

秦汉以前,龙不仅是祥瑞的象征,也是巫术行为中的重要角色。据张光直研究,龙在商周时期是巫觋沟通天地的使者。^⑧龙母能驾馭五龙,其巫神的神格十分明显。清代程鸣在《孝通庙旧志》

① 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3页。

②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6页。

③ 阮青:《〈淮南子〉注释本》卷18,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416页。

④ 陈摩人:《龙母传说的民族学考察》,《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第78页。

⑤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7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35年,第365页。

⑥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6,中华书局,1959年第1版,1982年第2版,第237页。

⑦ 《史记》卷28,第1366页。

⑧ 张光直:《神话·美术与祭祀——通往古代中国政治权威的途径》,敦净、陈星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47—52页。

中说：“（龙母）常于稠人中望空，似有与之应答。间有以出入询者，辄中祸福，时人目为神女。”^①龙母能预知祸福，是巫神无疑。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就曾认为：“始皇以为神，遣使迎媼。以尝闻徐福言海神之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意媼其同类也。”^②龙母被视为与海神同类之神，自然会受到秦始皇“玄珪之礼”的礼遇。“玄珪”是一种黑色的玉，其用途主要有二：一是拥有者具有某些权力的象征物；二是祭神时的重要礼器。^③秦始皇致聘龙母入京，可能是专门为其从事相关的巫术活动。《史记·封禅书》说：“是时既灭两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④从史书记载可知，南越国灭亡后，汉武帝在长安立越祝祠，专请越巫在京师搞鸡卜以驱鬼逐疫和祈寿成仙。汉代礼制又完全是因袭秦代的，^⑤因而，我们可以推断，秦始皇时期应有请越巫鸡卜的制度。尽管龙母未能成行，但秦始皇“以玄珪之礼聘媼”的动机，与历史上秦始皇迷信方士和仙术的心理是一致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郡县制度，创建了统一的国家机构和政治、经济制度。悦城龙母传说中提到的两个地名，也透露了秦汉时期郡县制的历史面貌。据记载，端溪县设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是秦汉时岭南15个古县之一。当时汉武帝（前156—前87年）派楼船将士十万，分五路大军，进攻南越国，最后杀掉叛乱的南越国相吕嘉（生卒年不详），灭南越国，以其地置南海、苍梧、合浦、郁林、日南、九真、交趾七郡。^⑥端溪县属苍梧郡，唐武德五年（622）改为南康州，贞观十二年（638）才改名为康州。《南越志》里的《端溪龙母》不提“康州”，而唐代《岭表录异》里的《悦城龙母》没有“端溪”的地名，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

始安江^⑦为漓水（即漓江——笔者注）的上游，其流经铁炉村一段与湘水（即湘江——笔者注）相距不足1.5公里，且水位差仅为6米左右。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命监御史史禄（生卒年不详）开凿著名的灵渠，即在此地。^⑧因而，始安江是连接湘江和漓江，沟通五岭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秦始皇也正是凭借此道，派大军南下，征服岭南的。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在今桂林市设始安县，即以此河流命名，足以说明其重要性。三国乌程侯甘露元年（265），置始安郡。所以，龙母传说中的“至始安江”或“至始安郡”都是指沿江到达桂林附近，这与秦始皇时期已开凿灵渠，水上交通可以从西江抵达漓江和湘江的史实是吻合的。

此外，龙母传说也反映了秦汉时期岭南造船业的发展状况。在岭南发现的属于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铜鼓，纹有体积较小、首尾不分的独木舟，还有平底小船。这说明在先秦时期，岭南已掌握了一定的造船技术和航行技能。1975年，在广州中山四路发现了秦汉造船工场遗址；1994年，在原址的西北面，又有新的重要发现。据学者研究，这个造船工场主要生产的是平底船，吃水较

① 欧清煜编：《悦城龙母祖庙》，悦城龙母祖母文物管理所，1992年，第43页。

② 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85年，第213页。

③ 尤仁德：《古代玉器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第85—86页。

④ 《史记》卷28，第1399—1400页。

⑤ 《史记·礼书》说：“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更改。”见《史记》卷23，第1159—1160页。

⑥ 余天炽等：《古南越国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4页。

⑦ 《太平寰宇记》、《渊鉴类函》均记作“始安江”。《永济行宫记》记作“始安郡”。惟《吴兴艺文补》记作“始兴江”。查《中国历史地图册》并无始兴江，东晋却有“始兴”的地名（今韶关市附近），在南北朝刘宋年间，升格为“始兴郡”，治所在今韶关市。但韶关距德庆并无千里之遥。故应为“始安江”。

⑧ 参见余天炽：《古南越国史》，第9—10页。

浅，适合内河和沿海岸航行。^① 越人除了将船用于生产、生活和军事目的外，还在每年一度的端午节用龙舟来竞渡。闻一多（1899—1946）在《端午考》一文中告诉我们，“寻常舟船刻为龙形，本是吴越一带的风俗”，“龙舟只是文身的范围从身体扩张到身体以外的用具，所以它是与文身的习惯同时存在的。”^② 在《端午节的历史教育》一文中，闻一多认为，用来竞渡的龙舟是一种被刻画成龙形的独木舟。^③ 这一推断可以在考古资料中找到佐证。1958 年在江苏武进，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三只独木舟；1973 年在福建连江也发现一只大约属于汉初的独木舟。秦汉统一以后，越人善于用舟的传统并未中断，考古工作者在过去越人的居住地域，如广东、湖南等省内，经常发现有汉代的陶、木船模型及独木舟等。^④ 笔者据此推测，龙母传说中所记“今人谓船为龙掘尾”，大概是对越人所造的一种叫“驳尾独木龙舟”的解释。龙子自桂林引龙母船还，“不逾夕，至本所”，极言速度之快。从中也可看出当时岭南造船业的发展水平。

正因如此，神话学家袁珂（1916—2001）在《中国神话传说》中也认为：“秦始皇时代，有两个传说故事，对后代有着普遍的代表性质：一个是关于陷湖的传说，一个是关于龙母的传说。”^⑤ 据《明洪武诏书》载，龙母“汉初封为程溪夫人”。^⑥ 清康熙德庆知州秦世科（生卒年不详）在《重建龙母庙序》中更是写道：“如州城之东，越百里有龙母庙，自秦而汉而晋而唐宋元明，膺封数十朝，享祀二千载，迄今颂其功，称其德，咸啧啧不置者，岂偶然也耶？”^⑦ 至今在悦城龙母祖庙，我们所看到的龙母墓碑上刻的也是“秦龙母墓”，为乾隆四十七年德庆知州蒋如燕（生卒年不详）所立。

今天看来，尽管龙母传说是秦代的产物尚缺乏正史上的依据，但考察龙母传说的具体内容，从历史记忆的角度，却可以找到许多蛛丝马迹。《龙母传说》在历史文献中的最早记载是在西晋时期，约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五百年之后。作为民间传说，从产生、流传到被整理、记录，也必定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到底有多长，我们难以估量，但可以从历史记忆中寻找证据。龙母传说与秦始皇发生联系并非故事情节的任意粘连，而是有着地域历史文化的积淀。从历史事件来说，它一方面曲折反映了秦始皇征服岭南时遇到土著力量顽强抵抗的事实；另一方面，又再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通过怀柔政策而逐步实现越汉融合的历史；从观念上看，它表现了秦始皇以龙为祥瑞的“水德”思想和迷信方士、仙术的心理；从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它再现了秦时端溪、始安等地已被纳入秦始皇的行政版图，开凿的灵渠已将西江和湘江沟通起来，岭南造船业达到相当水平的史实。因而，自唐代碑刻至清代庙志，人们均把龙母视为秦时之神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集体记忆”的根基。正如历史人类学者所指出的：“历史这只‘无形之手’实际上可能对林林总总的各种各样的传说进行了某种‘选择’，使传说中与实际历史过程相契合的内容，在漫长的流播过程中，得以保留下来。在其背后起作用的，实际上是人们对社区历史的‘集体记忆’。”^⑧ 可以说，悦城龙母传说形象而真实地反映了秦始皇统一岭南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历史状况，其起源十分古老，值得我们珍视。

（责任编辑 于光）

① 参见张荣芳、黄森章：《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第 282—285 页。

② 闻一多：《神话与诗》，古籍出版社，1956 年，第 236 页。

③ 同上，第 242 页。

④ 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第 42 页。

⑤ 袁珂：《中国神话传说》（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 年，第 707 页。

⑥ 《悦城龙母庙志》（2 卷），第 1 页。

⑦ 同上，第 33 页。

⑧ 陈春声、陈树良：《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以东凤村陈氏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历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第 126 页。